



南强史学丛书

吴小平 / 著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the
Bronzen Vessels from the Han Dynasty

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吴小平编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

ISBN 7—80665—584—0

I. 汉... II. 吴... III. 青铜器(考古)—研究—
中国—汉代 IV. 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1878 号

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

作 者: 吴小平

责任编辑: 管巧灵

封面设计: 黄 朝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5616(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306 千字

印数: 1—3,000

ISBN7—80665—584—0/G·441

定价: 26.00 元

承印: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路 92 号

邮编: 410013 电话: 0731—8923199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出版缘起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已经走过 80 多年的风雨历程。她建立于 1921 年，是厦门大学最早设立的系科之一，长期以来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的本科毕业生，数百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知名摇篮。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探索和薪火相传，我系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显著的办学特色，现拥有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国家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 6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8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并与海外许多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比较稳固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系在教学与科研相长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发扬传统研究特色，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学科生长点，科研论著迭出纷呈，受到学术界、教育界同仁的瞩目与赞誉。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系的教学科研事业，更好地展示和交流有关成果，我们特推出这套丛书，以期与同志友好为繁荣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科而共同努力。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2003 年 8 月

序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特别时期，时间不长也不短，史料不多也不少；有些历史现象到此结束，有些历史现象从此开始；当然更多的历史现象在此是上可追溯源流，下可查寻支脉，其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格外重要。所以汉代的历史研究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研究汉代的历史离不开考古资料，这是目前学术界的通识。仅从数量和字数上说，目前为止地下已出土的考古资料也已不遑须让于传世文献。因此对研究汉代历史文化来说，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犹如车之两轮，门之两扇，缺一不可，不能偏废。如今在汉代历史文化研究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或是有考古的学术背景，或是能充分利用汉简、帛书、画像石、画像砖、各种器物等考古资料，如此方能取得超乎常人的研究成果，就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李学勤先生曾在《汉代青铜器的几个问题——满城、茂陵所出金文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可惜近年对秦汉金文作综合研究的论作不多，许多疑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有大量新材料涌现，相当大的一部分尚未得到深入的考释研究。”受此启发，吉林大学徐正考教授曾有博士论文《汉代铜器铭文研究》之作并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嘉许。其实关于汉代青铜器的研究不只在铭文的研究上还大有文章可作，就是关于青铜器器形本身的考古学研究，以往的工作也是做得太少，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去钻研

探索。

晚近的青铜器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两周的青铜器，对汉代的资料则很少措意。这一方面是历史的惯势使然，一方面则是学术界的偏见所致。虽然汉代青铜器与两周青铜器相比，在器形种类、演变的复杂程度、社会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方面都不及后者，但是也有其长处和优势，如在研究工官制度、官府手工业、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状况等方面就是如此。在汉代青铜器中，青铜容器又是最大宗的资料，更具备典型意义。我为吴小平博士选定《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做为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出于以上的考虑。

《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利用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目前已知的汉代青铜容器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梳理。作者先将汉代青铜容器按地域分为三个系别，即中原、西南、岭南三个区系，然后对每个区系下的青铜容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和演变进行分析研究，基本排列出了每类器物的发展谱系。其中还大量涉及器物的命名、用途等方面的分析考证。除此之外，作者还从汉代青铜容器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统治政策对青铜容器的影响等角度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都是富有意义并颇具启发性的。作者在书后所附“汉代青铜容器出土情况”、“古代文献著录汉代青铜容器情况”和“六朝青铜容器出土情况”三个目录，极便于学者翻查检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工作，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当然，在资料的完备程度、考古类型学的运用及探索青铜容器所反映出的历史现象等方面，该研究还存在着错误或不足。这也正是作者立誓要进一步补充修改并长期探索下去的地方。

吴小平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受过多年的专业训练。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在教学和带实习之余，科研也很勤奋。

写博士论文期间，正赶上孩子小，加上教学和带实习，压力大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过着“炼狱般的生活”。好在他能咬牙坚持下来，顺利地通过答辩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吴小平博士朴实直率，虽然性格有点急躁，但是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对田野发掘的痴迷，预示着他今后在考古事业上的发展前途。如今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让我在书前写几句话，作为导师，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古人有举贤不避亲之训，故在此郑重地向学术界推荐此书。相信今后有关汉代青铜器更广泛深入的研究也将从此书开始。

刘 钊

2005年3月于厦大白城一线望海斋

目 录

第一章 汉代青铜容器发现与研究的简要回顾	(1)
第二章 汉代青铜容器的文化构成	(15)
第三章 中原系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	(27)
第一节 传统礼器的形制及其变化	(27)
第二节 新兴实用器类的形制及其变化	(85)
第三节 中原系青铜容器纹饰的类型与演变	(174)
第四节 中原系青铜容器铭文的分期	(193)
第四章 西南系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	(203)
第一节 西南系青铜容器的形制	(203)
第二节 西南系青铜容器的纹饰和铭文	(225)
第五章 岭南系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	(227)
第一节 岭南系青铜容器的形制	(227)
第二节 岭南系青铜容器的纹饰	(251)
第六章 各系青铜容器在汉代的走向	(255)
第一节 中原系青铜容器在汉代的变化过程	(255)
第二节 西南系青铜容器在汉代的走向	(266)
第三节 岭南系青铜容器的消亡过程	(270)
第七章 相关问题探讨	(273)
第一节 汉代青铜容器的文化统一进程	(273)
第二节 汉代青铜容器的生产经营方式及其变化	(279)

2 目 录

第三节	汉代青铜容器文化特征的形成、发展过程 及其影响	(293)
第四节	两汉时期的统治政策对青铜容器的影响 ...	(303)
参考文献		(309)
附录一		(331)
附录二		(363)
附录三		(364)
后记		(371)

第一章 汉代青铜容器 发现与研究的简要回顾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辉煌时代，其青铜容器由于富有文化内涵从而一直受到学术界的热情关注。相比之下，汉代铜器由于诸多原因则颇受冷落，至于其学术史方面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不容忽视的是，虽然汉代铜器已经失去了类似三代时期所拥有的辉煌地位，但它仍然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正如俞伟超先生所言：“在秦汉时代的四百四十年期间，中国古代的青铜艺术度过了最后的辉煌”^[1]。鉴于此，有必要将汉代铜器的研究历史进行认真的梳理，检讨我们在汉代铜器研究方面的成果和缺陷，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

根据我国各个时期汉代青铜容器研究的程度和内容，可将其历史大致分三个大的阶段来进行介绍和描述。

一、汉代青铜容器的收集和著录阶段

我国收集汉代铜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当时出现的一批收录汉代铜器的“金石学”著作便是例证。当时的著

作按内容可分下列几类:

图录类著作。《考古图》收录了汉代青铜容器 17 件,《续考古图》和《博古图录》收录了汉代青铜容器达数十件。每器均绘图,并摹写铭文,记大小、尺寸、重量等,对铭文也做了简略考证^[2]。

款识类著作。《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了汉代铜器铭文 41 条,《钟鼎款识》收录了 6 条,《啸堂集古录》收录了 14 条,每条有铭文摹本或释文^[3]。

考释类著作。《金石录》收录有 8 篇汉代铜器铭文“跋尾”,其内容涉及器名、断代等方面。《绍兴内府古器评》收录 2 条铭文,并有考释^[4]。

宋代以后的元、明两代为金石学发展的低潮阶段,没有汉代铜器著录和研究的著作。

清代从乾隆、嘉庆时期开始,青铜器著录和研究的风气复兴,当时收录汉代铜器的“金石学”著作有以下一些:

图录类著作。《西清古鉴》收录了 125 件;《宁寿鉴古》收录了 50 件;《西清续鉴》有 209 件;《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有 2 件;《怀米山房吉金图》有 5 件;《长安获古篇》有 9 件;《两壘轩彝器图释》有 4 件;《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有 18 件;《陶斋吉金录》有 53 件^[5]。

款识类著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收录汉代铜器铭文 89 篇;《筠清馆金文》收录了 19 篇;《张叔未藏金石文字》收录了 8 篇;《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收录了 20 篇;《从古堂款识学》收录了 38 篇;《奇觚室吉金文述》收录了 48 篇;《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了 31 篇^[6]。

上述著作对我国传世汉代铜器的收集有十分重要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宋至晚清时期的汉代铜器研究领域十分有限,主

要集中于对图的著录方面，对铭文的研究也仅仅停留于简略的考释，并未涉及铜器的形制分析、纹饰、断代或相关制度等方面，也未出现专门著录汉代铜器图像或铭文的著作，汉代铜器在当时金石学家的视野中还不占主要地位。

二、汉代青铜容器研究的初始阶段

民国时期，由于受到近代考古学的影响，铜器的研究方法和领域稍有变化，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汉代铜器所涉及的制度方面研究，如容庚在《秦汉金文录》序中云“欲求两京文字转变之迹，未有胜于器物铭者，即欲考铸铜之官、产铜之地、制器之数、度量权衡之制以及当时通行之吉语，皆可求之于此。”受此影响，其《汉代服御器考略》一文则将汉代铜器分为十类二十三种进行器物形制、年代和用途的考证，从而成为专门研究汉代铜器的开先河之作^[7]。

但是，受清代金石学影响，民国时期汉代铜器的研究仍以收录铜器图谱及铭文为主。此类著作有：《梦邨草堂吉金图》、《贞松堂吉金图》、《憲斋集古录》、《憲斋吉金图》等。汉金文收集的集大成者当为《汉金文录》。由于是唯一专门著录汉代铜器铭文的著作而深受后学赞誉。此书不仅收录的铭文齐全，其分类方法也为当时最为完善，如分为鼎、钟、钫、壶、权、度量、灯、乐器、杂器、洗、钩、兵器、补遗七大类，为汉代铜器铭文著录之典范^[8]。

三、汉代青铜容器研究的发展阶段

对汉代青铜容器的多方位研究是在1949年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大量的汉墓发掘与汉代铜器出土，使得汉代铜

器的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出土的汉代铜器大致有十万件以上,遍布于全国各地。其中重大的考古发现大致有: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出土了20件^[9],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了22件^[10],长沙汤家岭西汉墓出土了20件^[11],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24件^[12],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了42件^[13],满城汉墓出土了105件^[14],山西浑源毕村西汉木椁墓出土了22件^[15],江苏盱眙东阳汉墓出土了20件^[16],西汉齐王墓器物坑出土了88件^[17],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出土了13件^[18],广州汉墓出土了298件^[19],南越王墓出土了160件^[20],西安东郊国棉厂汉墓出土了19件^[21],四川开县红华村崖墓出土了62件^[22],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出土了21件^[23],安徽天长三角圩汉墓出土了50件^[24],山西朔县汉墓出土了22件^[25],荆州高台汉墓出土了52件^[26],陕县汉墓出土了91件^[27],湖南溆浦茅坪坳出土了18件^[28],河南偃师寇店出土了28件^[29],湖北蕲春枫树林汉墓出土了32件^[30],河南焦作嘉禾屯出土了17件^[31]。

这些经过考古科学发掘出土的铜器,其研究价值远远超过过去的著录品,是多方位研究汉代铜器文化的重要基础。在考古学学科不断完善的前提下,解放以后汉代铜器的研究领域得到飞速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器物的定名和用途考证 这类研究主要是结合文献对出土的铜器进行考证。如徐家珍的《熨斗、鏃斗和刁斗》从文献和考古实物出发,对熨斗、鏃斗和刁斗的形制进行比较研究,并就其用途进行了考证,认为熨斗是长柄平底无足、斗装火炭执柄熨烫衣料;鏃斗即刁斗,有三足或流^[32]。王振铎通过汉画像砖、画像石和出土实物结合文献对汉代酒樽、卮和甗的形式、类别进行

了探讨^[33]。裘锡圭的《鍳与鍳椈》一文对鍳和鍳椈名称、器形进行了考证，并认为其应是由竹提筒演化来的一种酒器^[34]。宁立新、黄盛璋、孙机、王仁湘等就染炉名称的由来和用途展开了讨论。宁立新在《四神染炉考辩》中否定了以前关于染炉为温酒器的说法，认为应是冬天对调味的酱进行温热的器具；黄盛璋的《染杯、染炉初考》和孙机的《关于染器——答黄盛璋先生》则主要侧重于染炉名称的考证；王仁湘、李开森的《是温酒器，还是食器——关于汉代染炉染杯功能的考古实验报告》对染炉的用途进行了实验，认为更可能是当时单人食用的火锅^[35]。郑同修的《汉晋鱼纹铜洗腰器考》则就汉晋时期流行的双鱼铜洗的用途进行考证，认为为婚嫁所用的腰器^[36]。对汉代铜器器名和用途考证的集大成者当属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37]，全书分111类，对汉代的物质文化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描述，其中包括了汉代几乎所有的铜器类型。

器物的形制与年代研究 叶小燕的《战国秦汉的灯及有关问题》对战国秦汉时期的灯进行了形制分类与年代研究，并对灯名的由来和演变、灯油和蜡烛的出现进行了探讨，认为灯应由豆演变而来，豆形灯是灯的最早形式，秦汉时期多以脂膏为油料，并未出现蜡烛^[38]。张小东的《鐎斗考》对鐎斗的器型来源、变化和用途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使用主要在汉南北朝时期，是当时的暖锅，文末还兼谈了鐎斗与刁斗的区别^[39]。黄展岳的《铜提筒考略》就铜提筒的分布、造型、用途和年代进行了论述，认为其流行地区和时期为：战国末汉初的滇国、西汉南越国和东山文化时期的越南红河下游三角洲，其用途因地而异，有葬具、贮贝器和酒器，文章末尾还就其与鍳、鍳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否定了鍳为提筒演化的说法^[40]。李陈奇的《蒜头壶考略》对战国汉初时期的蒜头壶形制及其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汉代的

长颈壶由其发展而来，并对蒜头壶的名称和用途进行了粗略的考证^[41]。陈文领博的《铜釜研究》对战国至三国时期的铜釜进行了类型学分析，探寻出铜釜早晚演化的逻辑关系和轨迹，认为铜釜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成都平原，秦灭蜀后传入秦地并随秦的统一战争流向全国，文章末尾还对铜釜用途进行了考证^[42]。刘弘的《铜釜与巴蜀之师》对釜的形制与年代、分布也进行了探讨，认为巴蜀军队是铜釜的传播者^[43]。

铭文研究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铭文考释和以之为基础的相关历史研究（如工官制度、地名、断代等）。

国内一系列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资料展开：

西安三桥高窑村西汉铜器群铭文 陈直的《古器物文字丛考》、《关于西安三桥高窑村西汉铜器铭文的几点意见》、黄展岳的《西安三桥高窑村西汉铜器群铭文补释》三篇论文就铭文解读展开了讨论^[44]。

满城汉墓所出铜器铭文 陈直在《出土文物丛考》中对满城汉墓出土的酒令铜器及铜的文字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考释解读。萧蕴、张振林、查瑞珍等对墓中所出铜壶上的鸟篆文字进行了释读和讨论^[45]。

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铜器铭文 负安志在《谈“阳信家”铜器》中进行了文字考释和“阳信家”铜器的断代。秦进才在《阳信家铜器铭文考订》中对“内者”“奉主”“尚卧、尚从”铭文提出不同的考证意见。李光军等后来又撰《“阳信家”铜器铭文补释》一文进行了补释。在前文考释的基础上，丰州、秦进才、赵化成等学者对阳信家铜器的所有者问题进行了讨论，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阳信家为“阳信夷侯刘揭之家”，另一钟观点则认为是汉武帝姐“阳信长公主”^[46]。

朱提堂狼洗铭文 方国瑜、孙太初和蔡葵对朱提、堂狼地

望、洗的制作年代、铭文及图案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考证，认为：朱提和堂狼均位于犍为郡内，其制造的鼎盛时期是东汉中西晚期，恒、灵帝时期由于战乱才逐渐萎缩，铭文和图案为汉族喜爱的吉祥语和动植物^[47]。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铜器铭文考释研究，如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器物坑铜器，李学勤和黄展岳便撰文进行了铭文考释；张崇宁对“建始铜灯”的铭文考释；王振芬对“汉平阳共鼎”的考证；李仲操对“羽阳宫鼎”的铭文考订等等^[48]。

以上相关的铭文研究因资料的零散而缺乏系统性，而弥补此缺陷的当为徐正考的《汉代铜器铭文研究》一书，此书是汉代铜器铭文及相关历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49]。该书分九章，分别就汉代铜器的著录、“物勒工名”制度、铜器纪年、铜器制作地和机构、生产数量、度量衡制度、铜器的转送等诸多方面一一进行了考证。书后附录的汉代铜器铭文汇集，是该领域目前所见最为完备的资料，其学术意义十分重大。

装饰工艺研究 汉代铜器的装饰工艺包括镶嵌、金银错、镀金、刻划、雕刻等方面，史树青、叶小燕从发展演变的角度对我国古代的青铜器装饰工艺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其中也包括了汉代铜器工艺的论述^[50]。王仲殊在《汉代考古学概说》一书对汉代铜器的花纹变化及其装饰手法也进行了概述（中华书局 1984 年）。杜迺松在《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书中对两汉时期青铜工艺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概述，认为：错金银与镶嵌工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新；鎏金技术达到高峰时期；细线刻划更加发达（紫禁城出版社 1995 年）。艾兰对汉代针刻铜器的分布和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可能为古代越人所作^[51]。蒋廷瑜的《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是目前所见对刻划铜器资料收集最为丰富的论文，该文从篆刻花纹铜器的种类、制作工艺、时代和制作

中心地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种类有案、承盘、酒樽、盒、长颈壶、提梁壶、扁壶、熏炉、灯等,花纹图案可分两类,一类为抽象性的几何形图案,一类为写实性的动植物图案,流行年代上起西汉中期,下至东汉晚期,最繁盛时期是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制作中心为广西东南部,文末对这种花纹的起源还进行了探讨^[52]。

生产经营研究 青铜器制造在汉代社会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其研究主要依赖于铭文,内容大致包括下列方面:制造手工业的性质、经营管理、生产规模和地区。陈直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王仲殊的《汉代考古学概说》、宋治民的《汉代手工业》(巴蜀书社1992年)、杜迺松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和徐正考的《汉代铜器铭文研究》的相关部分借助大量的铭文资料对生产规模和工官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综述与学术史研究 这方面研究包括两方面:汉代铜器发展概况和汉代铜器研究史。

前一部分除上文所提及的著作外,还有下面一些论文,如俞伟超的《秦汉青铜器概论》从艺术史角度对汉代青铜器在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论述,并将汉代铜器分为三个阶段:汉初是过渡阶段,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是汉代青铜艺术最发达和典型阶段,东汉中期至晚期是汉代青铜艺术的总结阶段。文中对各个时期的铜器组合、形制与年代、工艺特征和生产方式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53]。杨菊花的《汉代青铜文化概说》则从功能角度对汉代铜器进行解释,指出汉代铜器的功能表现为实用性,与三代“重神”有重大转变,汉代铜器的世俗化和商品化是其实用性的催化剂,从而促进了汉代铜器的繁荣^[54]。

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杜迺

松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和徐正考的《汉代铜器铭文研究》均有较大篇幅对中国古代铜器的研究史概况进行了介绍，赵化成、高崇文的《秦汉考古》辟一章节对汉代铜器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文物出版社 2002 年），这些成果对汉代铜器的收集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存在的问题

从上可见，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汉代铜器的研究领域已有较大变化，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汉代铜器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研究的数量不足 同商周铜器相比，汉代铜器的研究成果数量明显不足。目前所出的有关我国古代铜器研究的权威专著中，涉及汉代铜器的几乎没有，如马承源等编著的《中国青铜器》、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书中内容仅到战国为止。在建国以来出版的四百多部文物考古著作中，专门著录汉代铜器图片的仅一部，为《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卷》（文物出版社 1998 年）；专门研究汉代铜器铭文的也仅有徐正考的《汉代铜器铭文研究》一书。论文方面也大体相同，当前仅对一些汉代精品铜器或带铭文的铜器进行介绍或研究，公开报道的汉代铜器占汉代所有铜器的 5% 不到，大量的汉代铜器深藏于各地博物馆的库房中而得不到整理。这些都说明了当前学术界对汉代铜器研究依然重视不够。

研究的深度十分有限 商周铜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器类、器物群和纹饰方面的发展谱系已基本建立，地区特征和族属也颇受研究者关注。而汉代铜器方面，其研究深度显然无法与前者相